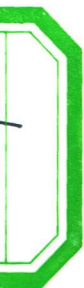




《学点历史》丛书

哲学史上的
先验论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学点历史》丛书

哲学史上的先验论

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史组编写

人 民 出 版 社

列宁语录

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语录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出版说明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号召下，广大工农兵群众，进一步掀起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

毛主席一贯重视学习历史，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学习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革命导师所讲的革命道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从而有利于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学点历史》丛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出版的一套历史普及读物。它不象一般历史书籍那样系统地、全面地去讲解历史，而是为了配合学习，简明扼要地、有所侧重地提供一些历史知识。《学点历史》丛书将分册出版，每册围绕一个中心（一本著作或一个专题），介绍一些有关的历史知识，供工农兵学习时参考。

这本《哲学史上的先验论》，通过中外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九个唯心论哲学家，扼要地介绍了先验论的种种表现形式，并且略加分析、批判。我们希望，本书有助于广大工农兵读者进一步弄清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从而更深入地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本书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2
中国哲学史上的先验论	4
孔 子.....	4
孟 子.....	10
董仲舒.....	16
朱 熹.....	19
王守仁.....	26
欧洲哲学史上的先验论	33
柏拉图.....	33
笛卡儿.....	37
康 德.....	43
黑格尔.....	51

前 言

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获得的？这是两千多年来哲学家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的回答，构成了认识论上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即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斗争。

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的这段话，科学地概括了认识论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并且对这个问题作了精辟扼要的回答。

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人的认识是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人的一切思想都是从后天的实践经验得来的。离开实践经验，思想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不可能发生。

与此相反，唯心论的先验论则否认人的认识来源于后天的实践经验，而断言人的思想是不依赖实践经验、先于实践经验就有的，也就是说，是先天具有的，所以叫做先验论。

在哲学史上，各派唯心论哲学家所宣扬的先验论，大致说来，不外两种形式：一种可以叫做客观唯心论的先验论，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另一种可以叫做主观唯心论的先验论，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人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这两种先验论，只是

在说法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别。说得之于天也好，说头脑里固有也好，总之都是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是先于实践、先于经验就有的。

在哲学史上，关于知识从何而来这个认识论上的争论，总是跟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这个历史观上的争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唯心论先验论，则是形形色色的唯心论的天才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理论根据。所有这些争论的实质，说到底，就是究竟谁是历史的主人，应当由谁来掌握国家和世界的命运的问题。这些争论，归根结底反映着各个时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几十年来竭力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唯心论的天才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用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中国革命。他们所宣扬的这种反动谬论，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新发明，而是从过去剥削阶级的唯心论哲学家那里拣来的破烂。为了彻底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贩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我们有必要做一点追本溯源的工作，查查他们的老底，看看这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骗子们在哲学上所继承的究竟是那家的衣钵。

毛主席指示我们：要读几本哲学史，包括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哲学从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学哲学史，可以了解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哲学斗争在各个时代的表现形式。有比较才能鉴别。这就可以帮助我们分清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路线斗争的觉悟，戳穿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谣言和诡辩。

中国哲学史上的先验论

孔 子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名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唯心论者。孔子出生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年轻时做过管理仓库、看管牛羊的工作,中年在鲁国做过大官,以后他收徒讲学,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流传下来的《论语》一书,记载着他的言论。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逐渐兴起。孔子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提出一整套反动学说,企图挽救奴隶社会的崩溃和灭亡。

孔子学说的中心是“仁”,即“爱人”。他所说的“爱人”,就是叫人们“爱”奴隶主贵族。他说:“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说,约束自己,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就是“仁”。“礼”,指的是“周礼”,即奴隶主贵族专政制度。孔子从各方面讲述、宣传“仁”的学说,就是妄想人们听从他那一套,去自觉地维护已经开始崩溃的奴隶制。孔子提倡“正名”,即主张严格按照“周礼”的规定,去维持奴隶制的等级秩序;他把反对和破坏奴隶制等级秩序的斗争,宣布为“犯上作乱”。为了论证奴隶等级制是

合理的，孔子宣扬“天命”，把人的贫富贵贱、生死祸福，都说成是人力无法改变的命运所决定的。他鼓吹“知天命”、“畏天命”，要人们安分守己，不做违反“天命”的事。他说的“天命”，实质上就是奴隶主阶级的意志。孔子用这些唯心论的说教，来麻痹人民，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效劳。

在认识论方面，孔子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孔子把人分为若干等，说：生来就知道的人（“生而知之者”）是上等的，学习了然后知道的人是次等的，遇到困难仍然学习的人又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就不学习的人就是下等的了。他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人。“生而知之”，就是说，他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不是通过后天的学习，更不是通过实践得到的。究竟什么人“生而知之”？孔子认为，“圣人”才是“生而知之者”。所谓“圣人”，是他认为才能和品德都超出一一般人之上的统治阶级的大人物。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尧、舜和西周的大奴隶主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等。孔子认为，这些“圣人”是奉“天命”“制礼作乐”来教化人民的，他们的智慧和德行是“上天”赐给的，所以他们是“生而知之”的“上等人”。他这个论点，就是说，“圣人”的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以客观唯心论的说法，宣扬了唯心论的先验论。

在孔子关于知识问题的言论中，也曾谈到后天学习的问题。但是他讲的后天学习，是叫人们向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圣人”学习，是要人们学习西周以来奴隶制的典章制度——诗、书、礼、乐等，是因袭古人，用来宣扬复古主义，不是叫人们从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探求知识，获得真理。他这个论点同样是和唯物论的反映论相对立的。为了引导人

们学古东西，孔子曾说，他不是“生而知之者”，他是喜好古代的东西并努力追求它的人。可是，他自认为是文王、周公事业的继承者，说什么复兴周朝文化的历史任务已经落在他的头上。他还自我吹嘘说：“天”赋给我德行。就是说，他的智慧和德行归根到底也是“天”给的，他的思想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人们要向他学习，他应该教育别人。

根据孔子的这种理论，后来的地主阶级的哲学家鼓吹“圣人生知”说。“圣人生知”的理论，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古老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它的形式虽然粗糙，但旗帜很鲜明。这种先验论的特点在于宣扬大人物的智慧、知识和才能是先于经验、先于实践而有的，用来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生而知之”的人。人的任何思想都是从经验中来的，而正确的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毛主席说：“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实践论》）实践出智慧，实践出真知。大人物的智慧和才能也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获得的，同样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历史人物的知识和才能也不是生来就有的，同样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环境的产物。马克思说：“如**爱尔维修所说的那样，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72页）孔子把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等吹捧为“圣人”，把他们说成是“生而知之者”，其目的无非是企图把那些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神圣化，把他们说成是受了“神”的启示来统

治人民的“英雄”，要奴隶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为奴隶主贵族专政作辩护而已。

为了宣扬“圣人生知”，论证少数奴隶主贵族应该统治人民群众，孔子又大讲愚民哲学。他认为，人民群众特别是奴隶生来就是愚蠢的，没有学习的能力，没有资格学习知识，只能听从奴隶主的支配。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说，只可以叫人民跟着走，不可以叫他们知道什么。孔子的逻辑是，人民群众认识能力很低，理解不了大道理，所以只能命令他们去做，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这就是宣扬“群氓无知”的愚民哲学。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们被看成是会说话的工具，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在文化上也没有任何权利。孔子宣扬“群氓无知”，就是为这种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作辩护。“圣人生知”和“群氓无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鼓吹“圣人生知”，必然宣扬愚民哲学，吹捧大人物具有天赋的才能，人民群众自然就是“阿斗”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劳动人民是唯一从事劳动生产的阶级，没有奴隶、农民和工人直接从事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一切文化都无从产生，也不可能发展。恩格斯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74页）我国奴隶时代的文化都是奴隶们创造的，而不是孔子所吹嘘的周公旦之流“天才”人物所赐予的。没有奴隶们的辛勤劳动和由此产生的巨大智慧，就没有殷、周两代的文明。劳动人民亲身参加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实践，

最有智慧，也最有才干。毛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孔子把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人物说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把劳动人民看成是“无知”的“群氓”，这是对历史的颠倒。他所以如此颠倒历史，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英国的贵族哲学家卡莱尔的英雄史观时指出的，其目的就是企图论证人民群众“**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307页）

为了证明“圣人生知”，孔子又宣扬了“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谬论。所谓“上智”，就是最聪明的人，指“生而知之”的“圣人”；“下愚”，就是最愚笨的人，指“不可使知之”的“群氓”；“不移”，是说不能改变。这个观点是说，聪明的人永远聪明，愚笨的人永远愚笨，“圣人”永远是“圣人”，奴隶永远是奴隶，他们的认识能力不能改变。这又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宣扬了唯心论的先验论。为什么认识能力不能改变？按着孔子的说法，“天命”是人力不能改变的，贫富贵贱是“命”里注定的，聪明和愚笨当然也是“命”里注定不能改变的了。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最终不得不乞灵于“天”和“命”作为它的支柱。

关于人在智力上的差别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60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智力上的差别主要是后天造成的。人脑和感觉器官以及人的认识能力都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由于社会分工的结果，人只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方面，从而造成了

人在智力上的差别。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一部分人脱离了劳动，脱离了实践，一部分人的能力受到了摧残和压制，又加深了这种差别。孔子把这种差别拚命加以夸大，归之于什么人力无法改变的“命运”，完全是唯心论的胡说。在辩证唯物论看来，人脑这个加工厂的能力同样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实践愈多，经验愈广，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就愈敏锐，头脑也就愈聪明；长期脱离实践，不用脑子，不开动机器，认识能力也就愈来愈衰退。所以人的认识能力不是不能改变的。人们通过后天的努力，刻苦的学习，反复的实践，智力上的差别是可以转化的。否认这种实践基础上的转化，就必定导致孔子所宣扬的形而上学的命定论。孔子当时所以宣扬这种形而上学的命定论，无非是为“贵者恆贵，贱者恆贱”的世袭的奴隶等级制度制造“理论”根据。

孔子所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圣人生知”说，“群氓无知”论和“上智与下愚不移”论，是荒谬的、反动的。这种论点的谬误，在于把认识和实践相割裂，否认认识来源于实践，在于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真理。千方百计地为奴隶等级制作辩护，就是孔子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的阶级根源。

孔子的唯心论反动学说，被我国历代的反动统治者所继承、所利用。从汉代开始，孔子的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了地主阶级统治和奴役农民的精神工具。在近现代，反动统治者如袁世凯、蒋介石，又提倡“尊孔读经”，继续用孔子的反动学说，为他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服务。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在他们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也抬起了孔子的早已破产了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孟 子

孟子(公元前371—289年),名轲,战国时期封建贵族的思想家,主观唯心论者。他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学习儒家学说,曾经游历各诸侯国,向各国统治者宣传他的学说和政治主张。孟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人物,他的学说和孔子的学说,被后世称为“孔孟之道”,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流传下来的《孟子》一书,记载着他的学说和一些活动。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正在形成。孟子站在封建贵族的立场,主张封建化。但是,他幻想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来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施仁政”的主张,反对进行兼并战争,认为:由统治者给农民一小块土地耕种,使农民有固定的产业,让他们“吃饱穿暖”,并用“仁”、“义”等封建道德教化他们,这样就可以统一天下了。他的这种“理想”,就是把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供贵族们剥削,并用封建思想统治他们,使他们不得有造反的念头,以建立和巩固封建农奴制的统治秩序。

为了论证他的主张,孟子提出一整套主观唯心论学说,特别突出的,是他的天赋道德观念论。

孟子认为,“仁”、“义”等封建道德观念,是人人“固有”的;他把这叫作“良知”(不经过思考就有的知识)、“良能”(不通过学习就有的能力)。就是说,这些道德观念都是人们生来就有的,是天赋的。孟子认为,只要人们发挥这种天赋的道德

观念，“仁政”就可以实现。孟子还把“不忍人之心”，即同情心，作为“仁”的根本，认为它是“仁政”的出发点。在他看来，只要封建统治者把这种生来就有的同情心发挥出来，推广到行政中去，办事情都想到人民的痛苦，就可以作全中国的皇帝了。说剥削者能够大发善心给被剥削者做好事，这是谎言，是搞政治欺骗，只能起麻痹人民的作用。

孟子又用“孝”、“悌”来解释“仁”、“义”。他说，小孩子生下来就知道爱父母（“孝”），这是“仁”；长大了就知道尊敬兄长（“悌”），这是“义”。他大力宣扬这种所谓天生就有的“孝”、“悌”，要人们驯顺地服从封建家长的统治。孟子心目中的国家，是家族的扩大，一国的统治者又是最高的家长。所以，这些关于“孝”、“悌”的道德说教，目的就是建立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天赋道德观念论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一种形式。孟子把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头脑里所固有的，这是以主观唯心论的说法，宣扬了先验论。人的道德观念决不是头脑里所固有的。它同其他的观念一样，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特别是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来的。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91页）毛主席说：“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马克思主义认为，有什么样的阶级，就有什么样的道德。父子、兄弟的道德关系，是随着阶级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的。孟子这一套道德说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它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观念和要

求，是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在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封建地主阶级用家族关系统治农民，并用它来掩盖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一族的族长，都是地主阶级的人物，他们用这个身分发号施令，统治和剥削农民。他们大力提倡“孝”、“悌”等道德，就是为的加强这种统治。他们认为，在家庭中能服从家长的统治，做一个“孝子”，在社会上就能服从君主的统治，为地主阶级效忠。因此，孟子所鼓吹的“仁”、“义”道德，叫人们爱父兄，其实是要农民“爱”地主阶级，驯顺地供地主阶级剥削。这种“爱”，是地主阶级的“爱”，是封建宗法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为封建剥削制度服务的。当废除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这种道德也就会逐步消失。孟子把它说成是什么“良知”、“良能”，说成是超阶级、超历史的东西，是头脑里固有的东西，这纯粹是唯心论的胡说。他宣扬这种先验论的目的，是企图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

从天赋道德观念出发，孟子又宣扬了主观唯心论的修养方法。在他关于道德修养的议论中，谈到有关人的认识能力问题。他把人的认识器官区别为两种：一种是“耳目之官”，一种是“心之官”，认为“心”的作用是思维，耳目的作用是与外物接触。这就是说，人有感性和理性两种认识能力。他认为，道德观念是靠“心”的思维作用来保持的，耳目感官驱使人们追求外物，容易把“心”引上邪路，因此只有充分发挥“心”的作用，摆脱耳目感官的诱惑，心中固有的“仁、义”道德才能发扬光大。他认为，只要用思维进行反省，“仁、义”道德观念就保持住了。

在孟子的这些议论中谈到有关道德修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和提高，决不是什么“内心修养”的结果，而是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经过长期锻炼而取得的。这是因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那种以为脱离实践，闭门修养，专靠“心”的反省作用，就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纯粹是唯心论先验论的胡说。孟子就是这种“修养”经的鼓吹者。他提倡这种先验论的修养方法，是要人们脱离实际斗争，按照封建的道德说教，闭门思过，把人“修养”成一个驯服的封建主义的奴仆。

孟子的这些议论，主要是就封建的道德修养说的。但是也涉及到人的两种认识能力（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问题。从认识论上看，他看到理性认识要靠“心”的思维能力，但是他片面夸大了“心”的作用，以“心”为贵，轻视感官的作用，以耳目为贱，从而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加以割裂，否认感觉经验是理性认识的基础，认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这样，便陷入了唯心论的唯理论。他从天赋道德观念论出发，提倡主观反省的修养方法，必然要倒向唯心论的唯理论。这种唯心论的唯理论，转过来，又成了他的天赋道德观念论在认识论上的支柱。孟子的这种唯理论，被后来的唯物论者斥之为“尊心贱耳目之说”，他被看成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的鼓吹主观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哲学家之一。

孟子宣扬这种唯心论的唯理论的目的，在于给“大人”（封建贵族）和“小人”（劳动人民）的区别制造“理论”根据。他曾说：没有“君子”就没有人管理“野人”，没有“野人”就没有人养活“君子”。又说：“大人”是“劳心”的，“小人”是“劳力”的；“劳

心”的人统治别人，“劳力”的人为别人所统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把剥削者说成是什么“劳心”的人，公开宣扬“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为什么“劳心”的应该统治别人？孟子的逻辑是：“劳心”的，能发挥其“心之官”的作用，懂得“仁、义”道德，所以应该统治别人；“劳力”的，追求“耳目口腹之欲”，不懂得“仁、义”道德，所以应该为别人所统治。这是赤裸裸地为剥削阶级寄生虫和吸血鬼作辩护的哲学，充分暴露了封建贵族讲道德、说仁义的伪善面貌。而唯心论的唯理论就是为这种地主阶级专政论作辩护的工具。极端鄙视生产劳动，一心想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过精神贵族的寄生生活，就是孟子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产生的阶级根源。

孟子从唯心论的唯理论出发，竭力夸张“心”的作用，鄙视感觉经验，又走上了拒绝向客观世界探求知识的主观冥想的道路。最后他得出了客观事物都在人心中的结论。他说：万物都在我心中具备了，反省内求而很实在，这是最大的快乐。其实这是主观唯心论者的自我陶醉。由于孟子顽固地坚持唯心论的先验论，终于导致了否认客观世界存在的荒谬的结论。

孟子认为，他这套唯心论的理论是“圣人”发现的，因为“圣人”最先懂得“仁、义”道德是人心所固有的。而“圣人”所以最先懂得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是人类中“超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他们的智慧是“天”赐给的，是“先知先觉”，他们的责任是用“仁、义”道德来教训人民。他的天赋道德论又成了他鼓吹天才论的理论基础。他自认为他就是这种“天才”的人物。他借古人的话自我表白说：“天”生下人民，是要使“先知先觉”的人，教训“后知后觉”的人；我就是“先知先觉”的

人，我要用“圣人之道”使人民觉悟。他的“先知先觉”说，实际上是孔子的“圣人生知”说的翻版。他这种说教无非是企图论证所谓“先知先觉”的“天才”人物应该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应该成为人民的统治者。

孟子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那些“先知先觉”的大人物创造的。他编造了一个历史规律，说什么自有人类以来总是“一治一乱”。这是宣扬形而上学的历史循环论。他认为，治乱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大人物出来，有大人物，天下就治；没有大人物，天下就乱。他又为大人物的出现编造了一个规律，说什么每隔五百年必定有个圣王出来。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受天命”的“先知先觉”，也是五百年出现一次的大人物，历史的任务已经落在他的头上了。他说：如果“天”想把天下管理好，使天下太平，在当代，除了我之外还有谁？他同孔子一样自我吹捧，说自己就是“天才”，就是“英雄”。历史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的，是通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主要是阶级斗争）表现这种规律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这一规律，总是用唯心论的先验论，把自己说成是“天才”、“英雄”、历史的创造者，愚弄人民群众，以达到他们统治和剥削人民群众的目的。唯心论的天才论、英雄史观必然是剥削阶级的理论。

总起来说，孟子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核心是“良知”说。他从“良知”说出发，宣扬了天赋道德论，唯心论的唯理论，唯心论的天才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孟子的这套唯心论的先验论，被以后的封建统治阶级继承下来，成了他们宣扬天赋观念论、唯心论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的依据。于是孟子又被地主阶级吹捧为封建社会的第二号“圣人”。

董 仲 舒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104年),汉朝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家,神权论的鼓吹者。他提出一套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服务的理论,主张尊奉儒家学说为正统思想,得到汉武帝刘彻的赏识,作了大官;儒家的“孔孟之道”从此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现存董仲舒的著作有《春秋繁露》和《举贤良对策》。

秦末的农民革命战争,严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汉王朝建立后,农民起义仍在不断爆发;地方的封建势力也还存在。董仲舒提出的一套理论,正是为了巩固汉王朝的中央政权,麻痹农民的斗争意志并削弱封建的地方势力。他大讲神权论,把“天”描绘成有意志、有人格的上帝,是最高的主宰,把一切自然现象,都说成是上帝意志的表现;而皇帝是“天意”的代表,因此皇帝应该主宰一切。他用神权“论证”君权的至高无上、不可违抗。他把“孔孟之道”神化,把孔、孟的道德说教发展成为封建主义的教条,成为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理论根据。为了论证封建制度的永恒不变,他大肆鼓吹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矛盾论》)这种思想就是董仲舒提出来的。他也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宣扬者。

董仲舒提出了“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就是说，臣要绝对地服从君，子要绝对地服从父，妻要绝对地服从夫。他企图用这种封建教条来加强三大绳索——政权、族权和夫权对农民的统治。他宣称“三纲”是从天上来，是上帝制定的，上帝的意志永不改变，四时运行的法则不变，封建教条也永不改变，这就是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样，他又用封建神权论来加强地主阶级的政权、族权和夫权。

为了论证“三纲”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董仲舒提出了“正名”论，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他认为，“名”是根据“天意”产生的，是区分是非、善恶的准则。他说：根据事物的名去衡量实际的事物，看它是否与它的名相符合，就可以弄清楚事情的真假了。例如，封建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被称为“天子”，董仲舒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是“天的儿子”，“天”叫他来统治人民。如果“天子”不崇拜“天”，不统治人民，就同他的“名”不相合了，那就是错误。又如，封建社会中的第二号统治者叫“诸侯”，董仲舒解释说，“侯”就是“伺候”的意思，应该好好“伺候”“天子”，如果“诸侯”不“伺候”“天子”，便同他的“名”不相合，那就是错误。又如，封建社会中的“民”，董仲舒又解释说，“民”就是“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生来糊涂，愚昧无知，只能受统治。如果劳动人民不受统治，起来反抗，那就不符合“民”这个词的含义，就应该被镇压。

董仲舒所讲的这套“正名”论，是非常荒唐的。从认识论上看，他这种理论，是宣扬一种客观唯心论的先验论。我们知道，事物的名词和概念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在人们头脑中的反

映。毛主席说：“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实践论》）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不是名决定实，而是实决定名。而董仲舒却把名和实的关系颠倒过来，认为先有概念，后有事实，大讲以名定实，不是用事实来检验概念，而是用概念去规定事实。这样，“名”便成了脱离事实、先于经验的东西，成了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董仲舒就是用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把君、臣、父、子之名说成是人们行为的绝对标准，用来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

他这种理论，被后来的地主阶级哲学家发展成为“纲常名教”的学说。“纲”就是“三纲”。“常”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他们认为这些道德是永恒不变的，所以称为“常”。“名教”，是说根据等级身分之“名”进行说教，只看名不看实。不管为君、为父、为夫的实际上是怎样的人，只要他居于君、父、夫的地位，有君、父、夫之名，他对臣、子、妻就有绝对的统治权力。按照这种唯心论的逻辑，当君的，即使是一个昏君，甚至叛国投敌了，因为他叫做“君”，当臣的仍然要对他效忠。“纲常名教”论是维护封建等级制的凶恶武器。

董仲舒认为事物的名是先于事物而有的。但名究竟怎么来的？他抬出了神权论。说什么名来源于“天意”（即上帝的意志），是“圣人”奉“天意”制定的。这就是说，真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上掉下来的真理先落在“圣人”的头脑中，“圣人”把天上掉下来的真理，宣布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用来教化无知的“群氓”。剥去他这些谬论的神秘外衣，无非是说，地主阶级

的统治意志就是绝对的真理。这就是董仲舒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反动实质。

在董仲舒看来，只有“圣人”，才能接受从天上掉下来的真理。“圣人”有这种特权，所以就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指挥历史，创造历史了。他说：上帝的命令，不经过“圣人”就不能实行。又说：“圣人”所规定的就是天下的准则。“圣人”成了上帝的代理人。他认为，孔子就是上帝的代理人，他甚至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儿子，说什么孔子奉“天命”写了《春秋》，为后来的汉王朝制定了国法，孔子的智慧可以说是“前知千岁，后知万世”了。孔子经过董仲舒的吹捧，由“出类拔萃”的“天才”人物，终于变成了“神”；不仅“生而知之”，而且是“神而先知”。到了董仲舒手里，唯心论的先验论成了神秘主义的先验论，唯心论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终于发展为神权史观。哲学唯心论和宗教唯心论本来就是一家人。董仲舒的哲学表明，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到底，不过是精致的信仰主义而已。董仲舒自以为他的神权论和先验论可以防止农民革命的爆发，可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并不以董仲舒的意志为转移，到了西汉末年又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西汉王朝，宣告了董仲舒哲学的破产。

朱 熹

朱熹(1130—1200年)是宋朝的地主阶级哲学家，中国哲

学史上有名的客观唯心论者。他在宋王朝作过官，晚年讲学，是十三世纪以后宣扬“孔孟之道”的官方代表。朱熹的主要著作有《四书集注》、《文集》等。

董仲舒所宣扬的那套为纲常名教作辩护的神权论，在历代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已经不灵了。于是朱熹一派地主阶级哲学家，又变换手法，炮制了一种唯心论的体系，为封建的纲常名教作辩护，作为统治农民、抵制农民革命的精神武器。他们把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封建教条宣布为“天理”，把不符合这种教条的言行宣布为“人欲”，大讲“存天理，去人欲”的封建“理学”。“理学”的理论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朱熹就是“理学”的鼓吹者。

朱熹一派把“理”作为整个唯心论体系的核心，所以这派哲学叫做“理学”。朱熹认为，每个东西，每件事情，都有它的“理”。他说：船只能在水上行，车只能在陆上行，就是船和车的“理”。又说：当臣的侍奉君，便有“忠”的“理”；当儿子的侍奉父亲，便有“孝”的“理”。朱熹讲的“理”，是不是等于事物的共性或事物的规律呢？不是。事物的共性或规律，是依赖于客观事物而存在的，没有离开客观事物的共性或规律。朱熹所说的“理”与此相反，它是独立于客观事物之外，而且是先于客观事物存在的。朱熹认为：具体的事物是有形象的，“理”是没有形象的，“理”和具体事物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理”虽然没有形象，但它主宰有形象的具体事物，是在具体事物之上独立存在的。例如，个别的君、臣、父、子有生有死，有善有恶，有贤有愚，可是只要是个臣，就得对君尽忠，只要是个子，就得对父尽孝，忠君孝父之“理”，并不受个别人物的变化的

影响。他这个观点，后来被称为“理在事上”。他还认为：在没有事物之前，就已有事物之理了。他说：在没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个“理”，有这个“理”，才有这个天地。又说：没有君臣之先，已有忠君之“理”，有了君臣之“理”，才有君臣关系。他的这个观点，后来被称为“理在事先”。总之，朱熹认为，事物之理可以脱离具体事物单独存在；有某种事物的理，才有某种具体的事物；具体的事物有生有灭，而“理”却不生不灭，永恒存在。

朱熹所讲的理和事物的关系，就是普遍（一般）和特殊（个别）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普遍本来存在于特殊之中，一般本来存在于个别之中。世界上并没有脱离白狗、黑狗、大狗、小狗而单独存在的“一般”的“狗”。在封建时代，所谓“忠君”，不是忠于秦始皇，就是忠于汉武帝，没有脱离忠于个别皇帝的“一般”的“忠君”，更不可能还没有皇帝，就有什么“忠君”之“理”。可是，朱熹把普遍和特殊加以形而上学地割裂，把普遍（一般）说成是脱离特殊（个别）而单独存在的东西。这样，他所讲的“理”，就不是事物的规律和共性，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先于具体事物的普遍概念了。朱熹把反映客观事物的概念看成是客观存在的实体，看成是事物的根本，他宣扬先有概念而后有事物，其结果，客观的物质世界变成了“理”世界的化身。这就是朱熹的客观唯心论。朱熹把“理”看成是万物万事的根本，目的在于论证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之理”，即“忠君”、“孝父”等封建道德，是永恒不变的。按照朱熹的客观唯心论的逻辑，“忠君”不是忠于个别的君主，而是体现“忠君”的“理”，因此，当臣的不能计较他的君是否值得效忠，只要他是

个君，就应无条件地对他效忠。由此，他又得出结论说：“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朱熹就是企图用这种唯心论的说教，叫人们绝对服从封建教条的奴役，用来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一治。

朱熹认为，“理”是离开具体的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但它又存在于每一个事物和每一个人的心里，好比一个月亮“印”在不同的江湖之中（“月印万川”）。所以他说：“理得于天而具于心”，又说，每个人的心都“具众理而应万事”。这就是说，人一出生，“理”便从“天”上落在他的“心”中，正象月亮“印”在江湖之中；人的理性认识是先天就有的，不是后天获得的。既然人心生来就具有“众理”，是不是只要闭目反省，就可以得到“理”呢？朱熹认为，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在他看来，“理”从“天”上落到人的心里，又被人的“气质”（指耳目感官、情感欲望等生理方面的性能）蒙蔽了，不能显露出来。因此，他提出了“即物穷理”说。“即物”，是说同事物相接触。他认为在同事物的接触中，受到启发，能使心中“已知之理”在意识中再显现出来。这就是“即物穷理”。例如，在同君父的接触中，在读孔孟的“经书”时，受到启示，使“私欲”得到克服，心中固有的“忠君”、“孝父”之“理”便显现出来了。他认为，“穷理”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对其心中之理的认识就可以“豁然贯通”，一切事物的里里外外，或精或粗，就全都明白了。

朱熹的这些说法，是宣扬一种精致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他不承认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他认为人生来心里就具有各种各样的关于事物的规律性的知识，这是十足的天赋观念论。他所说的“即物穷理”，不是叫人们通过感觉经验

和调查研究达到理性认识，获得知识，而是通过同外物的接触，刺激心中固有的观念，使之明确起来。这和唯物论的反映论是根本对立的。他认为“穷理”的前题是保持“心”的思维作用不受耳目官能的迷惑，同样轻视感觉经验，以为单靠理性思维就可以得到真理，这又宣扬了唯心论的唯理论。至于他所说的“一旦豁然贯通”，那是宣扬一种神秘的灵感，以为凭这种灵感，就可以“大彻大悟”，通晓一切，更是滚进宗教神秘主义的泥坑中去了。

朱熹的这些说法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唯心论体系的先验论的实质。毛主席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矛盾论》）朱熹的“即物穷理”说，同认识过程中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辩证法完全相反。他鄙视有形象的具体事物，否认矛盾的特殊性，轻视感觉经验，拒绝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从而把认识过程中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加以割裂，既不承认一般从特殊中来，又否认再回到特殊中去，这样，他所说的“理”（一般）就成了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成了先于经验、超于经验的抽象的概念。他把这种抽象的概念看成是超自然的东西，认为在没有世界以前就已在什么地方存在了，这是典型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朱熹宣扬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的目的，就在于论证封建教条，是从“天”上那个“理”世界来的，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在这种唯心论的基础上，他大肆宣扬了“存天理，去人

欲”的封建主义的说教。他把“三纲五常”等封建教条说成是人心固有的“天理”，把一切同封建教条相抵触的言行宣布为“人欲”，认为“人欲”是同“天理”相对立的，是要不得的东西。他认为：穿衣吃饭是非常微末的小事，苦心追求，“犯义犯分”，破坏了等级名分，就是“人欲”。根据这种谬论，朱熹这一派的理学家还提出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封建教条，说什么宁可饿死，也不能“失节”（违反封建道德），“失节”就是违背“天理”。地主阶级就是用这种封建的说教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以至叫人饿死而不感到是受迫害。这就是吃人的礼教。朱熹这套理论被后来的唯物论者斥之为“以理杀人”。而唯心论的先验论就是为这种用“软刀子”杀人的礼教作辩护的工具。

朱熹依据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又进一步宣扬了唯心论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他一方面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切的理，都具有“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另一方面又说，只有“圣人”才懂得这个道理，才能把心中之理全部发挥出来，而人民群众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认为，这是因为“圣人”是“聪明睿智”的人，在“天”生他的时候，是用“清气”造成的，具备完全的气质（“五气”——金、木、水、火、土），所以他的才能和智慧生来就比一般人高；而人民群众是“愚昧无知”的，在“天”生他的时候，气质就不全，而且是由“浊气”造成的，所以需要“圣人”来教化。他说：“圣人”好比“宝珠”在清凉的水中，自然明亮，而“愚不肖”（指人民群众）好比珠子落在“浊水”中，必须去掉污泥浊水，才能发光。他这套关于“天才”的胡说八道，同古希腊唯心论哲学家柏拉图的“金、银、铜、铁”论（详后）是一类的

东西。他企图用这种谬论把地主阶级的代表说成是天生的“天才”人物，是“天理”的体现者，把人民群众说成是“不知不觉”的“阿斗”，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制造“理论”根据。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同样渗透了封建等级制的精神。

朱熹自称为“孔孟之道”的继承人。他为“孔孟之道”的传授，编造了一个系统，说什么从尧、舜开始，经过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传下来，孟子以后便中断了，到了他这一派哲学家的手里才又发扬光大起来。这就是所谓“道统”。他认为，这个“道统”的继承人，都是“天才”的人物，历史的创造者。他当然也是“天才”人物，历史的创造者了。可是阶级斗争同样是不依朱熹的意志为转移的。从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不断爆发农民大起义，把封建王朝和朱熹所炮制的“道统”打得落花流水，封建制度终于走上了没落和衰亡的道路。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朱熹之流自封为“天才”的“英雄”，而是人民，是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

朱熹的这套唯心论的先验论又被后来的封建地主阶级继承下来，作为他们反对人民革命的凶恶武器。近代史上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大刽子手曾国藩就是朱熹学说的拥护者。他自称是“道统”的继承人。他一手挥舞着屠刀，一手捧着“经书”，打起“卫道”的旗帜，向革命人民猖狂反扑。说什么农民起义破坏了“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秩序，造成了数千年来“名教之奇变”，使孔、孟亡灵“痛哭”于地下。他搬出来朱熹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把他自己比作气质完备而又“清且厚”的“圣人”，自认为是“救世主”；把人民群众说成是气质“污浊”的“下愚之人”，不但不懂得而且戕害了“仁义”道德；声称他对

革命人民进行的血腥镇压是合“理”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和英雄史观是反动阶级的思想武器，在这里揭示得特别清楚。

王 守 仁

王守仁(1472—1528年)，又叫王阳明，是明朝地主阶级哲学家，有名的唯心论者。主要哲学著作有《传习录》、《〈大学〉问》。

王守仁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忠实爪牙，农民阶级的凶恶敌人。他出身于大官僚家庭，历任明王朝的重要官职。他一生的主要活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破山中贼”和“破心中贼”。所谓“破山中贼”，就是镇压农民起义；所谓“破心中贼”，就是反对不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意识。他多次带兵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并采取兴办“团练”(地方的地主武装)、施行“十家牌法”(十家互相监视、互相担保)等反动措施，加强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镇压和统治。同时，他大肆宣传他的反动理论，力图从思想领域巩固封建的统治。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是维护封建思想的卫道士。

王守仁的哲学被称为“心学”，是以孟子的“良知”说为基础的主观唯心论。王守仁把个人的“心”(“良知”)看成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提出了“心外无物”说。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个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客观世界依赖于主观意识而存在，

一切事物都在我的意识之中。他提出论证说：天没有我的“灵明”（指精神），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离开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万物了。又说：今看死的人，他的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这是说，各人都有各人的天地万物，没有客观存在的世界，个人的精神消失了，他的天地万物也就没有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末由此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从这个前题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一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28页）王守仁把孟子的“良知”说终于引向了唯我论，这是主观唯心论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王守仁讲“良知”，把孟子所讲的“不学而知”的天赋观念加以发挥，认为整个物质世界都在天赋的观念中，个人的天赋观念创造一切，这是最露骨的唯一论的先验论。他宣扬这种世界观的目的，在于把封建的道德意识说成是宇宙的主宰，把封建教条归之于人心的产物，从思想上来麻痹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

王守仁又提出“心外无理”说。他认为，万事万物之理也都在人的心中，不在人的心外。他说：“心”好比树根，“理”好比枝干，有个忠君的“心”，就有忠君的“理”；君、父死了以后，我心中仍有忠、孝之理，可见“理”在心中，不在心外；以此推论，“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由此，他得出“心外无理”的结论。他这些观点是说，人们关于规律性的认识，不是从客观世界中来的，而是头脑里主观自生的。这是以主观唯心论的形式宣扬了天赋观念论。他认为君、父死了以后，人们头脑里仍有忠君孝父的观念，以此来证明“理”在心中不在心外。这是

一种诡辩。毛主席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忠君、孝父的观念是封建专制政体和宗法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在封建社会，个别的君、父虽然死了，可是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专政依然存在，人们的头脑里就仍有封建的宗法思想。当封建制度消灭了，忠君孝父的观念也就不能统治人们的头脑了。王守仁关于天赋观念的论证，同朱熹的说法形式上虽然不同，本质却是一样，都是同唯物论的反映论对立的，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

在王守仁的眼里，不仅道德观念是主观自生的，一切观念都是主观自生的。因此在方法论上他又提出了“致良知”说。“致”是充分发挥的意思。“致良知”，就是说，通过“内心反省”的功夫，克服所谓“人欲之私”，使心中固有的天赋观念充分发挥出来。因此，他竭力反对追求经验知识。他把“致良知”说成是“学问的大头脑”，把感觉经验看成是“见闻之末”，断言感觉经验妨碍天赋观念的恢复。他和他的门徒又公开攻击反映论，把反映论比做“以镜照物”，说什么在“照”上用功夫，得不到真理；说什么把镜子擦干净了，去掉心里的“私欲”，不用照，真理自明。他对朱熹的“即物穷理”说也表示不满，认为朱熹的说法，仍不免使人追求外物，不能使心中之理明确起来。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事物本来是没有“理”的，把人心中的“理”充分发挥出来，推到事事物物中去，事事物物也就有“理”了。王守仁的这些观点，不仅认为理性认识是主观自生的，而且又宣称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他的这种方法论，被后来的唯物论者讽刺为“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的先验论。

列宁说：“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28页）王守仁的哲学走的是从思想到物的路线。他坚决反对认识开始于经验，把个人的思想看成是唯一的存在，取消主观和客观的差别，用主观来代替客观，力图从根本上否定唯物论的反映论。

王守仁还进一步把他的“致良知”说引向反理性的直觉主义。他认为“良知”不仅不靠耳目见闻，也不靠理智的思维，而是“好善恶（讨厌）恶”的感情。他说：“良知”就是“好恶之心”，如同爱好美色、讨厌恶臭一样是不经过思索的；“良知”所爱好的就是“是”，“良知”所讨厌的就是“非”。这是以主观的好恶作为是非的标准。毛主席教导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王守仁把认识和实践加以割裂，把个人的主观意志和好恶感情作为真理的标准，更加暴露了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腐朽性。他的“致良知”，说到底，就是叫人们好地主阶级之所好，恶地主阶级之所恶，叫人民群众不要用理智分辨是非，不要思考，绝对顺从地主阶级的意志。

王守仁在江西镇压农民起义时向农民宣称：你们的“良知”被“私欲”蒙蔽了，成了“恶人”；要知道，“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一念而善”，便成为“善人”，“一念而恶”，便成了“恶人”。所谓“一念而善”，就是说，不需要学习和思考，只要念头一变，好地主阶级之所好，“良知”就充分发挥出来了，就成了

地主阶级所认为的“好人”。这就是王守仁用来麻痹农民革命意识的新手法。他把这种新手法称之为“明白简易”的学说。其实，这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渴望立即挽救自己命运的幻想。王守仁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就是为地主阶级的这种幻想制造“理论”根据。

王守仁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还宣扬了“知行合一”的学说。他认为，“知”是“行”的开端，“行”是“知”的完成，“知”得很笃实即是“行”。就是说，当知道某种道理时，就意味着“行”的开始，对某种道理知道的很透彻，就是“行”了。这就从根本上抹杀了知和行的差别。他把这个论点进一步夸大，又得出结论说：看见美色属“知”，喜好美色属“行”，可是当看见美色时就已经喜好了，所以人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总之，他把知看成行，而且把好恶欲求等心理活动也看成是行，这就是他的所谓“知行合一”。

王守仁讲的“合一”，就是把知和行合二而一，把行溶化在知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知和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差别又有联系。毛主席说：“**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论》）而王守仁却把知、行的辩证关系加以割裂，他不承认真知从行中来，相反，主张知先行后；他不承认知依赖行，相反，主张行依赖于知；从而把知片面夸大，终于导出了以知代行的谬论，把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完全否定了。王守仁把行溶化在知里，无非是宣扬人的一切行动都从先天的“良知”中来，天赋观念就是一切。他的“知行合一”说，同样是十足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王守仁宣称：愚夫愚妇都有“良知”，人人能“致良知”，都

可以成为“圣人”。似乎他不承认有“天才”的人物。其实，他是用另一种形式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他说：人的气质生来就有“清浊粹驳”的不同，所以人的天资生来就有上、中、下的区别。他认为，“圣人”好比“精金”，没有铜铅的杂质，质量最纯；“圣人”的才力也有大小的不同，如金子的份量有轻重一样，份量虽不同，但都是纯金，都是“圣人”。因此“圣人”不经过学习锻炼，他的言行自然合乎“天理”，所以是“生而知之”的上等人。下等人生来质量不纯，份量又轻，所以要努力锻炼，但锻炼不是为了增加份量，即增长智力，而是去掉不纯的杂质，即去掉“私欲”，恢复“天理”，这样，才能虽然低下，可是精神境界却同“圣人”一样了。他的这些胡说八道，无非是说，劳动人民生来愚昧无知，不能也不应该追求知识，可是在道德上却应向“圣人”看齐，从而把自己“修养”成一个驯服的封建主义的奴才。他的唯心论的天才论是地地道道的愚民哲学。

王守仁自认为他的哲学是“圣人之学”，他的历史使命就是恢复“圣人之学”，用来教化“下等人”。他当然也是“圣人”的继承人了。他同他的祖师爷孔子、孟子一样，打着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大旗，自封为“英雄豪杰之士”，企图阻挡历史的前进。可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粉碎了他的迷梦。明朝末年，爆发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推翻了明王朝，王守仁的哲学宣告破产。

王守仁这套唯心论的先验论，到了现代又被独夫民贼蒋介石继承下来，成了他用来鼓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破烂武器。他自称是王阳明的信徒，大肆鼓吹“致良知”，胡说：“就我们的本性，来发挥我们的良知良能，决心力行，一往直前”，“杀身成

仁”，“无所畏惧”。这是说，按着“良知良能”拚命干，即使不成功，也要豁出命来干到底，人虽然死了，可是在“道德”上却取得了成就。这就是他鼓吹的“不成功便成仁”的“力行”哲学。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就这样变成了法西斯的反革命哲学。这套反动哲学，宣扬盲从，鼓吹顺着反革命头子的意志拚死干，所谓“杀身成仁”，不过是用来鼓动其党徒为他卖命效忠的精神麻醉剂。这套反动哲学充分暴露了即将灭亡的反动阶级的疯狂性和虚弱性。而唯心论的先验论就是他这种封建法西斯哲学的理论支柱。

总起来说，中国哲学史中的先验论，从孔子到王守仁，尽管在理论上愈来愈精致，不断出现新花样，可是万变不离其宗。他们都是天赋观念论、唯心论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的鼓吹者。他们都是继承和阐述他们的老祖宗孔子所提出的“生而知之”这个古老的先验论的命题。这就是他们的基本路线。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玩弄许多新奇的诡辩手法和烦琐的语句，为这个古老的命题作辩护而已。只要抓住他们的不变本质，他们新的欺骗手法，也就不难戳穿了。

上边讲的中国哲学史中的先验论，属于“孔孟之道”即儒家的系统。在中国哲学史上，宣扬先验论的，还有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唯心论的系统和佛教唯心论的系统，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欧洲哲学史上的先验论

柏拉图

柏拉图（公元前 427—347 年）是古代希腊贵族奴隶主的反动哲学家。他出身贵族奴隶主家庭，搞过反动的政治活动，失败后建立了一个学园，专门讲学。他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建立庞大的唯心论体系的哲学家，也是欧洲哲学史上最早的先验论者之一。他的著述很多，流传下来的作品主要有：《美诺篇》、《斐多篇》、《理想国》等。

柏拉图的哲学是一种客观唯心论，“理念论”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核心。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讲的什么呢？他所说的“理念”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知道，我们随时随地接触到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事物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个别的东西，例如，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条黄狗，那一条黑狗；这一幢楼房，那一间平房；等等。这条黄狗和那条黑狗不一样，这幢楼房和那间平房也不相同，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哲学上叫做特殊性、个别或个性。可是，这条黄狗和那条黑狗都是狗，这幢楼房和那间平房都是房子，个

别的事物之间有共同性，哲学上叫做普遍性、一般或共性。柏拉图把普遍性、一般或共性，作了唯心论的解释，说它是独立于个别事物并且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一种精神的本质，把它叫做“理念”；有关“理念”的一套谬论，被称为“理念论”。

柏拉图认为，理念是永恒的、不变的、唯一真实的存在。各个特殊的東西不过是理念的影子、仿制品，而且是不清楚的影子，不十分象的仿制品。例如，方的桌子，方的屋子等一个个方的东西的方的形象，不过是“方”这个理念的影子、仿制品。一个个方的东西的方的形象，都不能说是绝对的方，而且经过不断地磨损、破坏，还可以变成不方，所以，这些个别的方的东西的方的形象只是暂时存在的，只有“方”这个理念才是绝对的方，而且是永恒不变的。

柏拉图从他的理念论出发，提出了先验论的认识论。柏拉图说，理念和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由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构成的世界是“感性的世界”，是人们可以感觉到的。理念的世界是“理智的世界”，是人们感觉不到的，只能通过理性去认识。是不是可以通过对个别事物的感觉上升到对理念的认识呢？柏拉图说不能。他认为，我们感觉到的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只是理念的模糊的仿制品、虚幻的影子，没有什么真实性，这样的感觉不仅不是知识的来源，反而成为认识真理（理念）的障碍。要认识理念，就必须抛开一切感觉经验，单凭灵魂的“理性之光”去直接“见”到理念。

柏拉图宣扬“灵魂不死”的迷信。据他讲，人的灵魂本来就在理念世界之中，对于一切的理念全都认识，而且在灵魂和肉体结合的时候，它也是带着这些知识来的。不幸，在降生的

时候，受肉体的影响而把这些知识忘记了。但是通过学习还可以把这些知识回忆起来。学习的过程并不是去得到原先不知道的新的东西，而只是恢复灵魂原先就有的知识，所以可以称之为回忆。灵魂回忆的最后的完成是“见”到理念世界中最高的理念，即“善”的理念。柏拉图认为，“善”的理念不仅高于其他理念，而且是其他理念的创造者，是一切真理的源泉。一个人一旦“见”到这个理念，就比如从黑暗的洞穴中走出来看到光辉的太阳，对理念世界的认识就达到了绝对完满的地步。这种知识是人的认识的最高程度，也就是哲学的知识。

照柏拉图的这些说法，人的正确思想都是先天具有的，都是从“理念世界”这个“天”上掉下来的。这就是他的客观唯心论的先验论。

从上面可以看到，柏拉图在认识论上提出先验论，是他形而上学地割裂普遍和特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必然结果。

普遍和特殊，或者说共性和个性，在客观事物中，总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普遍(共性)不在特殊(个性)之外、之上，而是在特殊之中。毛主席说：“**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矛盾论》）例如：“方”（共性），是包含在方的桌子、方的屋子……等等之中，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没有方的桌子、屋子……一切特殊的方的东西（个性），也就没有“方”。假如离开桌子的方、屋子的方……一切特殊的方，还有什么“方”可说呢？柏拉图否认这种普遍和特殊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把普遍从特殊中割裂出来，放在特殊之外、之上，认为“理念”是产生一切事物的本原，正如列宁指出的：“**原始的唯心主义认为：一般（概念、**

观念)是单个的存在物。这看来是野蛮的、骇人听闻的(确切些说:幼稚的)、荒谬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420—421页)

人的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是从对一个个具体事物的感觉经验开始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理性认识。例如:人们是在接触方的桌子、方的屋子……等等许多方的东西的基础上,才产生出“方”的概念。离开了对于方的东西的感觉经验,同它们“根本绝缘”,就不可能有什么方的概念、方的“理念”。柏拉图割裂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否定“理念”从感觉经验得来,因此,他不得不用“灵魂回忆”的荒唐说法来说明人对“理念”的认识。

柏拉图的“理念论”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的谬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世界的运动、发展是永远没有完结的,因而人们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也是永远没有完结的。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永不停滞的过程。与此相反,柏拉图把理念看做是先天固定、一成不变的东西,认为只要把它“回忆”出来,真理就被揭示无余,人类的认识就到了顶、绝对完满了。这种认识到顶的胡说,是一切唯心论的先验论共同具有的谬论,是和人类认识史相反的,是阻碍人们的认识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反动理论。

柏拉图鼓吹这一套唯心论的先验论,是为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制造理论根据的。他露骨地为奴隶制度辩护,宣扬反动的宿命论,都是和他的唯心论先验论分不开的。他认为,世上各种的人,天生就不是一样的材料,命运自然应该不同。最少数的统治者,是神用金子作成的;保护统治者的卫士、爪

牙等，是神用银子作成的；农夫和手艺人 是神用铜和铁作成的。至于奴隶呢，那就连破铜烂铁也算不上，所以应该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根本不能当人来看待。柏拉图说，用金子做成的最少数的统治者，是“生性优秀的成分”，天生具有真正的“智慧”，一个国家只有由他们来治理，才能成为好的国家。而哲学家则是优秀者中的最优秀者，天才中的天才，他有最高的智慧，能“见”到“善”的理念，所以一定要让他为“王”。柏拉图诬蔑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是“生性低劣的东西”，是受私心物欲的支配而不知节制的，一个国家要是由他们来统治，这个国家就会灭亡。他主张，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奴隶主和奴隶，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要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扰”。柏拉图说，这便是“公正”，这是“自然的原则”，是不可改变的。这种赤裸裸地鼓吹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谬论，恰好暴露了柏拉图所谓“自然的原则”的阶级本质，也明白地暴露了他的唯心论先验论为奴隶制的统治秩序辩护的反动性。

笛 卡 儿

笛卡儿（1596—1650年）是十七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是近代唯心论的唯理论、先验论的最早的宣传者，主要哲学著作有《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原理》等。笛卡儿又是数学家、自然科学家，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

在十七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依附于封建专制的王权之下，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需要科学技术的知识，但是，它又不敢同封建的意识形态决裂，彻底打破封建神学体系。这种矛盾在笛卡儿哲学中有明显的反映。笛卡儿把自己的哲学分成两个部分：“物理学”和“形而上学”（这里的“形而上学”一词，指抽象的哲学体系）。在“物理学”中他提出了机械唯物论的自然观，认为物质是唯一的实体，物质的本质是广延性即占有空间的性质，物质和它的广延性是无限的。但是，他否认物质本身具有运动的能力，因此，终究不得不把上帝又搬出来，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物质运动的能力是上帝给的。在“形而上学”中，笛卡儿讨论了心灵的本质、心灵和物体的关系、认识的途径和方法、上帝的存在等问题，表达了他的唯心论世界观的基本观点和先验论的认识论。

笛卡儿是一个二元论者。他认为有两个截然不同、各自独立的实体：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在人的身上，心灵和肉体就是这样两种不同的实体。心灵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东西，它不依赖于任何物质性的东西而存在，它和肉体是各自独立的。但是，笛卡儿又认为这两种实体都是上帝这个最高的精神实体创造的。所以，所谓二元论归根结底还是唯心论。

笛卡儿的唯心论先验论和他的二元论是密切联系着的，他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割裂就是以心灵和肉体、精神和物质的割裂为依据的。他认为，人通过身体感官所得到的各种感觉并不反映外界事物的性质，而只是表现身体感受刺激的状态，人可以根据感觉而趋利避害，但不能由感觉而获得对

事物的正确认识。要得到可靠的知识，只能靠心灵本身的理智活动。正如心灵是完全独立于身体而存在一样，心灵的理智活动是完全不依赖于感觉经验的。这就是笛卡儿的唯理论，也就是一种唯心论的先验论。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实践论》）哲学史上以笛卡儿为代表的“唯理论”一派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们颠倒了事实，否认感觉经验的实在性，否认理性来源于感性，这样就把理性认识变成主观自生的东西了。笛卡儿公开提出所谓“天赋观念”说，就是认为人的许多最根本的观念，如数学公理、自然规律、物体观念、自我观念、上帝观念等等，都不是从经验得来，而是“天赋的”，即与生俱来、头脑固有的，而归根结底又是上帝赋予人的。

笛卡儿非常重视方法论的问题，他从唯理论出发，认为理性直观和推论是求得真知识的唯一可靠途径，而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的逻辑演绎方法，则是运用理性直观和推论以建立科学的知识系统的典范。一切科学领域的知识，包括哲学在内，都应当按照这种方法去建立起来。笛卡儿所说的这种数学方法是以唯心论先验论的精神曲解了的，他完全否认数学知识的经验来源，认为数学方法之所以确实可靠，就是因为数学是从一些最简单的所谓直观自明的公理原则出发，推导出一个理论系统来的。其实，数学的对象就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数学上的数的概念和形的概念虽然很抽象，但是不能因此抹杀它们的客观来源。比如，总得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形的概念，才能研究出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各个定理。至于数学的公理之

所以好象是不证自明的，那恰好是因为它们曾经被人类亿万次的实践所反复地检验过，证实过，并作为不容置疑的最起码的常识一代一代地传授下来。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如果我们中间，例如数学公理对每个八岁的小孩都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都无需用经验来证明，那末这只是‘积累起来的遗传’的结果。**”（《自然辩证法札记和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610—611页）

照笛卡儿的想法，哲学也应当象数学一样，找到自己的绝对可靠的自明的最基本的原则，并从而推演出全部体系来。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曾经指出，这种所谓从自明的公理原则推演出哲学体系的方法就是先验论的一种表现。恩格斯说：“**他（按指杜林）的方法就是：把每一类认识对象分解成它们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把同样简单的所谓不言而喻的公理应用于这些要素，然后再进一步运用这样得出的结论。……这不过是过去爱用的玄想的或者也称为先验主义的方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按照这一方法，某一对象的特性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也就是说：“**它不是从现实本身推论出现实，而是从观念推论出现实。**”（《反杜林论》，92—93页）笛卡儿就是这种“先验主义方法”的一个创始者。

笛卡儿自己的哲学就是运用这种先验方法的一个标本。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样从观念推论出现实的。

笛卡儿认为，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哲学体系，首要的当然是要找到一个象数学公理一样确实无疑的出发点。怎样找到呢？笛卡儿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普遍怀疑”。他说，我们从幼年还不会独立思考的时候，就接受了许多习以为常、信以为

真的观念，说不定是受了骗的。我们最好先把我们过去所知道所相信的一切，从对上帝的信仰到对外部物质世界的观念，统统都怀疑一下。笛卡儿声明，他所说的“怀疑”并不是否认知识、否认真理的怀疑论，而是一种达到真理的手段；不是为怀疑而怀疑，而是要通过怀疑找到一个无可怀疑的立脚点，由此建筑起新的知识的大厦来。笛卡儿从“普遍怀疑”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我怀疑来，怀疑去，最后总有一点怎么也怀疑不掉，这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怀疑也就是一种思想活动，所以“我在思想”是不容怀疑的。既然我在思想是无可怀疑的，所以作为思想主体的我的存在也是无可怀疑的。这样，笛卡儿就得出了他的有名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一切都可以怀疑，就是不能怀疑我自己！这就是“普遍怀疑”的奥妙所在。这是道道地地的主观唯心论。

笛卡儿告诉我们，他这里所说的“我”，指的是一种精神的实体——心灵，它可以没有身体、没有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地点而独立存在。“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是“我”的第一个“天赋观念”。我怎么知道这个观念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呢？笛卡儿说，这是因为，也仅仅因为它在人心中是非常“清楚明白”的。因此，我们又可以建立一条“一般的原则”，就是：“凡是极清楚、极明白地设想到的东西都是真的。”显然，这也是一条主观唯心论的原则。因为它认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据客观实践，而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按照这条原则，许多荒诞无稽的观念都可以被宣布为真理。事实上，笛卡儿正是依据这条主观唯心论的原则推出了“上帝存在”的荒谬结论。他说，我的心里有一个清楚明白的上帝的观念，这个观念

是比我更完满的，因此不能由我自己把它创造出来，而只能是由一个真正比我更完满的存在把这个观念放进我心里来的，它就是上帝。

笛卡儿用观念的清楚明白性这条先验论的原则推出了上帝的存在，又反过来用上帝的存在来加强他的先验论的思想，宣称清楚明白的观念之所以是真的，就是因为它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上帝是一切的创造者，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从上帝而来。我们原先觉得可以怀疑的许多东西，例如关于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存在，都可以从上帝得到保证了。因为，上帝创造了自然界并且在自然界中建立了这些规律，另一方面，上帝又把这些规律的概念印入我们的心灵之中。所以我们对自己心中的这些观念充分“反省”之后，就决不会再怀疑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存在了。

笛卡儿承认物质世界的存在，可是，这经过了一番先验的推演，从“我”这个观念引出上帝这个观念，再由上帝这个观念引出物质世界来。只有绕了这么个大圈子，世界才能托福于上帝而向笛卡儿证明自己的存在。

笛卡儿以为，他的这一套推论，象数学命题的演绎一样合乎逻辑。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逻辑”，倒是充满了自相矛盾：他鼓吹“普遍怀疑”，却又归结到对上帝的信仰主义；他要求用“理性的尺度”裁判一切，却又迫使理性向上帝取得保证。又是主观唯心论，又是客观唯心论，笛卡儿的“形而上学”就是这样一个混乱的杂拌。

笛卡儿的时代，宣扬迷信盲从的封建神学还占居统治地位。笛卡儿哲学中的唯物论成分和理性的演绎方法，是反对

封建神学的，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他的唯心论、先验论，使他陷于自相矛盾，使他反封建的思想不能彻底。后来，法国唯物论哲学家，发展了笛卡儿哲学中的进步方面；另一部分反动哲学家，则发展了他的唯心论、先验论。

康 德

康德(1724—1804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也是近代西方哲学史上主观唯心论先验论的最大的代表人物。先验论这个名词就是从他那儿来的。他公开宣称，他的哲学是先验的唯心论。康德出生在一个手工业者家庭，长期在大学里教书，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

康德生活在十八世纪的德国。那时的德国，封建的生产关系还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的发展非常缓慢。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极其软弱无力，它一方面很向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又害怕人民起来革命，所以它又不可能象法国资产阶级那样，用革命的手段来消灭封建制度，而是向封建贵族妥协，幻想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

康德哲学，就是这种极其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表现。列宁说：“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3页）这个特点正反映了德

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

康德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康德对自然科学进行了很多研究，有很大的贡献。在康德以前，自然科学领域里，还是牛顿力学体系为代表的宇宙不变论占统治地位。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自然界一开始就是这样，没有发展变化；把宇宙的起源，留给“上帝”。牛顿就认为，物体是依靠外力才运动的，“上帝”是宇宙的“第一推动力”。康德第一次提出宇宙星云说，认为太阳系以及一切行星都是从旋转的星云团形成起来的。康德用天体内部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矛盾，说明天体的发生、发展和转化，这就把自然界看做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把辩证法带进了自然观。恩格斯对康德的这个假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宇宙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反杜林论》，54页）康德在这个时期的思想具有唯物论的倾向。他有一句有名的话：“给我物质，我就能用它创造出世界来。”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从物质产生出来的。

但是，康德前期思想中的唯物论倾向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即康德哲学发展的后期，他的注意力转向了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的研究，建立了一个主观唯心论的体系，详尽地发挥了他的先验论的思想。

康德在后期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要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一番考察。他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就题为：《纯粹理性批判》。所谓“纯粹”，就是“绝对独立于任何经验”；所谓“纯粹

理性”就是指人所固有的、独立于一切经验的、先天的认识能力。康德说，他就是要“批判”地考察一下人的这种先天的认识能力，看看它究竟有多大的范围和限度，以便使人能正确地使用自己的这种能力，而不致误用了它去追求它力所不及的东西。康德的这种提法，正如主张人先在岸上学好游泳术再下水游泳一样荒谬可笑，必然导致一系列的唯心论先验论的臆想。实际上，人的认识能力和一切知识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都是长期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没有先天的、现成的、一成不变的认识，也没有先天的、现成的、一成不变的认识能力。要离开人的社会实践和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来研究人的认识能力并且预先给它规定一个范围和限度，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康德借着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宣扬先验论，归根结底，是为了证明我们的认识不能越出自己的意识的范围，不能正确反映外部的客观世界，不能认识客观事物本身，因此，照他的看法，就应当把在我们意识之外不可能认识的东西交给宗教信仰去处理。康德毫不隐讳地说，他之所以贬抑理性能力，就是“为信仰保留地盘”。

康德并不否认有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外界事物，他称之为“物自体”（或译“自在之物”）。他也承认人的感觉是由“物自体”刺激人的感官而引起的。但是，他又认为，感觉只是人的一种浑沌模糊的主观心理状态，丝毫不反映“物自体”的性质，连低级的认识也算不上，不过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材料而已。因此，在康德看来，感觉就不是人通向外界的桥梁，而是把主观与客观隔绝的鸿沟和屏障，“物自体”则成了永远不可认识、不可企及的“彼岸世界”。承认“物自体”客观存

在,又认为它不可认识,这就是康德的“不可知论”。

“物自体”既然是不可知的,“物自体”引起的感觉既然只是一堆混乱的材料,还不成其为知识,那末,我们是否还谈得上具有知识呢?如果有,那是什么样的知识呢?

康德说,真正的知识必须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比如说:“每个变化必有其原因”,或者说“有因必有果”,这是普遍如此,必然如此的。康德认为,存在着这样的知识是不成问题的,例如,数学和自然科学就是这样的知识。问题是在于:我们怎么能够有这种知识?也就是说,这种知识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康德认为,人的感觉是杂乱无章而且因人而异的,所以不可能从中求得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例如,“太阳光照在石头上必然使石头发热”这一认识,就我们的感觉来说,只能是我们用眼睛看一看得到太阳光照着石头的感觉,再用手摸一摸得到石头发热的感觉,至于说前者必然引起后者的这个“必然”,我们既看不到也摸不着。由此,康德断言,必然性的认识根本不可能从感觉得来,而只能是从我们的先天的认识能力来的,只能是我们的头脑中的先天知识加到这些孤立零散的感觉上去的。于是,康德宣称:“必然性和严格普遍性是先天知识的可靠标准”,而所谓先天知识就是指“绝对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知识”。

康德捏造出一些所谓人生来就有的“先天的认识形式”,主要的有两种,一种叫“先天的感性形式”,一种叫“先天的思维形式”,这也就是人的两种先天的认识能力,前者是“直观能力”,后者是“思维能力”。知识就是由这两种因素构成的,二

者缺一不可。

所谓“先天的感性形式”，就是指时间和空间。唯物主义认为，时、空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没有离开物质运动的时、空，也没有离开时、空的物质运动。康德则完全否认时、空的客观性，把时、空和客观世界（“物自体”）割裂开来，把它们说成是人先天具有的对事物进行直观的两种现成的框框，人就是通过这两种框框、也只能通过这两种框框去感受事物，并用这两种框框去整理感觉，使之带上时空的条理性。这样，就使事物失掉了它原来的样子，而以一种与“物自体”迥然不同的“现象”呈现在人的面前。这就好比说人生下来就戴上了两副永远摘不下来的有色眼镜，看任何事物都给它加上颜色，使事物的本来面目永远认识不到。康德又说，先天的时、空形式是一切人共同具有的，不会因人而异，所以经过它们整理的“现象”就不再是个别人的感觉，而成了人类普遍经验的对象，而且具有了所谓“客观性”。康德以为用所谓普遍经验或集体经验来冒充“客观性”，就可以掩盖他的主观唯心论的本质了，这种狡辩完全是徒劳的。他既然把“现象”同客观存在的“物自体”彻底割裂开来，把“现象”说成是人的先天认识能力的产物，那还有什么客观性可言呢？

正如列宁在批判康德割裂“现象”和“物自体”时所说的：**“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原则的差别。差别只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92页）我们所感觉到、所认识到的现象是事物本质的表现，我们总是通过对事物的现象的认识不断地深入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世界上只有我们暂

时还没有认识到的东西,没有我们绝对不能认识的东西;我们根据已经得到的对事物的认识去实践,去改造客观世界,如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就证明我们的认识是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的,从而也就驳倒了康德所谓“物自体”不可知的谬论。

康德认为,要构成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仅仅有“先天的感性形式”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先天的思维形式”(又叫做“先天的范畴”),如质、量、因果性、必然性等等。康德说,这些范畴是人的先天的“悟性”(或译“知性”)的能力所固有的。所谓“悟性”,也就是使用这些范畴去进行思维的能力,康德也把它叫做“思维的能动性”。康德认为,人进行思维,就是用自己头脑中固有的这些思想框框,即所谓“悟性范畴”,对已由“先天感性形式”整理过的感觉经验再进行综合、联结、加工,使之成为具有一定的质、一定的量以及一定的因果关系等等的东西。这样,才能把感觉经验真正变成认识的对象,也才能真正构成知识。例如,前面说过的阳光照射石头和石头发热这两个感觉经验,照康德看来,必须通过思维,把它们放在人所固有的“先天因果范畴”之下,才能使我们说:前一感觉(阳光照射石头)是后一感觉(石头发热)的原因,因此,前者必然使后者发生。这样,人才能使这两个感觉经验成为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认识对象,才能得到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不是人用来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的用具,而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和规律性的反映,是人从长期积累的丰富的经验材料中概括出来的。从感性经验上升到对事物普遍本

质的认识，这是人的认识的一个能动的飞跃。对事物普遍本质的认识即思维范畴转过来又指导着人们对事物进行具体的深入的研究，这也是人的思维的能动性的表现。可是，康德把思维的能动作用片面夸大和歪曲，走到了极其荒谬的地步，他不仅否认了理性认识的经验来源，把范畴说成是“先天的思维形式”，而且否认了认识对象的客观性，把认识对象及其规律都说成是人的思维活动创造出来的，似乎离开了人的思维活动，就无所谓认识对象，无所谓自然界及其规律。康德宣布：“悟性本身是自然界的规律的来源”，“它本身是自然界的立法者，没有悟性就不会有自然界”，“整个宇宙，包括无尽的空间及整个天体，都在先验的意识之中”。康德的这些狂言呓语，把他的先验论的主观唯心论的本质真是暴露得淋漓尽致。

康德认为，除了先天的“感性”和“悟性”两种认识能力之外，人类还有第三种认识能力，叫“理性”。“理性”的先验概念叫“理念”。“理念”和“悟性”的概念不同，“悟性”概念是和“感性直观”的对象打交道，给“直观”对象即“现象”以规律和秩序，但现象还是相对的、有限的、不完整的。“理念”则更上一层，把“悟性”的规律和关系系统统综合起来，使之成为绝对的、无限的、完整的统一体。康德提出了三种“理念”：“世界”是物理现象的绝对的、完整的统一体，“灵魂”是精神现象的绝对的、完整的统一体，而“上帝”是这两者的统一，是最高的统一体。康德说，“理性”在规定绝对的、无限的、完整的“理念”时，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悟性”的范畴，而“悟性”范畴只能用来规定经验之内的、有限的“现象”，不能用来认识超越经验之外的“物自体”，否则就要陷入谬误的推论和自相矛盾之中。例

如：要认识“世界”这个物理现象的完整的统一体，用“悟性”范畴如“原因和结果”去认识，就会陷入所谓“二律背反”，即：既可以证明“存在着世界的最初原因”，也可以证明“不存在世界的最初原因”。康德认为，“理性”在试图把握作为绝对的、无限的、完整的统一体的“理念”时必然陷入矛盾，就表明“理性”也没有能力超越“现象”的有限之物，而达到对“物自体”的认识。因此，“物自体”不能认识，只能信仰。

从上面看到，康德的先验论，从它提出问题到最后分析“理性”，都是同唯物论反映论相对立的，都是荒谬的。它打着分析人的认识能力的招牌，结果是为了“论证”宗教信仰必须存在。这充分反映了十八世纪德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妥协、屈从。

康德的唯心论先验论是贯穿于他的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的。在伦理学方面，康德认为人们先天具有“善良意志”，按照它作事，就是“善”，反之就是“恶”，而不管效果如何。这是一种唯心论的动机论。在美学方面，他从先验论出发，提出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艺术，大肆鼓吹天才论。康德认为，感性、悟性等认识能力，是人人先天具有的，但艺术上的天才是个别艺术家特有的，是“天生的心灵秉质”。康德甚至把古代的一种迷信观念也搬来了，说什么天才“就是一个特异的，在一个人的诞生时赋予他的守护和指导的神灵，他的那些独创性的观念是从这里来的”。因此，康德认为，天才的艺术创作是绝无仅有、无法学习的。康德把天才说得如此神乎其神，是十分荒谬的。所谓天才，无非是说有的人聪明一些。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人的知识和才能是有差异的，而且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但

是,这种差异连同人的知识、才能本身,都不是什么先天就有的禀赋,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通过主观的努力、学习和锻炼得来的,任何伟大人物的卓越才能都不仅仅是某个个人的创造,而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和集中表现。艺术上的才能也不能例外。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在这里从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对文学艺术才能的真实来源作了唯一正确的深刻的说明,也是对唯心主义天才论的有力的批判。

黑 格 尔

黑格尔(1770—1831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他创立了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论体系,系统地阐发了唯心论辩证法。黑格尔出身官僚家庭,长期在大学里教书,他的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大逻辑》、《哲学全书》等。

象康德一样,黑格尔也是当时具有反封建的要求而又不敢革命的怯懦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因此,他的哲学具有进步和保守两个方面。一方面,就其整个体系来说,他的

哲学是唯心主义的，是保守的；另一方面，在这个保守的唯心主义的体系中又包含着进步的宝贵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反杜林论》，21页）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地吸收和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

黑格尔的唯心论哲学也是一个先验论的典型。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先验论体系是“忠实地抄袭”黑格尔哲学体系时曾经指出，杜林“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这完全象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反杜林论》，32页）

黑格尔是怎样从思想中来构造世界的呢？

黑格尔不赞成康德把思想范畴仅仅看成是人主观具有的概念，而认为范畴、概念是独立于并且先于自然界和人类而存在的。他把这种范畴、概念叫做“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类似柏拉图的“理念”，也是割裂普遍和特殊，把普遍概念夸大为一种不依赖于物质的独立精神实体的结果。

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就象宗教的上帝一样，是创造一切的造物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从它那儿派生出来的，不过黑格尔是用玄妙的哲学的语言来描写这个创生的过程罢了。据黑格尔说，“绝对观念”从它自身的存在到创造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行程。这个行程有三个阶段：逻

辑阶段、自然阶段、精神阶段。

逻辑阶段就是自然界出现之前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绝对观念”是以纯粹概念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作为一个逻辑范畴的体系存在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是一个“阴影的王国”，这个王国摆脱了“一切感性的具体性”，也就是说和任何现实的具体事物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时候还根本没有任何现实的具体的事物。黑格尔说，这些概念、范畴并不象形而上学者所设想的那样是孤立静止、不转化不发展的，而是处于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和转化发展之中。概念、范畴的运动发展的源泉就在概念、范畴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的矛盾，由于内在矛盾的展开就使一切概念、范畴都否定自己而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黑格尔把这种概念、范畴的运动叫做“矛盾进展法则”，也就是辩证法。黑格尔曾经明确地表述了一系列重要的辩证法的规律，如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等。但是，他的辩证法是讲的概念的自我发展，不是讲的现实世界的发展，他否认概念的辩证法是现实辩证法的反映，相反，却把概念辩证法看作创造世界的独立的精神力量，因而他的辩证法是“头足倒置”的，是神秘的、唯心的。

黑格尔说，“绝对观念”在完成了纯概念形式的发展以后，就使自己“外化”，转化成了自然界。这就进入了自然阶段。黑格尔认为，自然界是“绝对观念”的“异在”，就是说，“绝对观念”本来是精神的东西，却给自己披上了物质的外壳，而以一种同它的精神本性相异的形式存在了。黑格尔认为，自然界没有时间上的发展，只是在空间上把“绝对观念”的那些范畴用物质的形式展开，自然界的各种东西，从无机物到动物，都

是早已存在的某一范畴的相应的物质体现，它们是同时并存的，而且一切物种永远重复着同一的过程、同一的形态，没有进化，没有发展。黑格尔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回到了旧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他的唯心论体系是不容许他把辩证法运用于物质世界的。

“绝对观念”又经过新的发展，最后出现了人，于是就进入了精神阶段。黑格尔说，在自然阶段，“绝对观念”是没有意识的，它还不认识自己。现在它才终于在人的身上达到了自我意识，即通过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而认识到了自己。这样，“绝对观念”就从它的“异在”恢复到了自己的精神的本性。

黑格尔所讲的“绝对观念”的发展，就是“绝对观念”从不认识自己到认识自己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绝对观念”不可能一开始就直接认识自己，它必须经过一个曲折，派生出自然界和人类，也就是把自己分化为客体和主体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通过作为主体的人类对作为客体的世界进行思维才能达到自我认识。因此，“绝对观念”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认识者又是被认识的对象，既是思维又是存在，这就是黑格尔提出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学说。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他的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黑格尔提出这个原则是与康德的不可知论对立的。他反对康德把思维和存在看作僵固的对立，把“物自体”推到永远不可认识的“彼岸世界”。黑格尔说，这样的“物自体”是一个“空洞的抽象”，是根本没有的。在他看来，世界是“绝对观念”的“异在”；它的本质和内容，就是在“绝对观念”创造世界以前早已存在的那些思想范畴。人的思维对世

界的认识并不是去认识某种和思维不同的东西，而是从世界中认识到思维所本来具有的内容，所以，思维和存在二者不可能有一道鸿沟，而必然是同一的。恩格斯在谈到黑格尔从唯心论立场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时指出：“**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17页）“要证明的东西”就是指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点早在黑格尔关于“绝对观念”创造世界这个唯心论的基本前提中就已经被设定了。这就是一种先验论。

辩证唯物论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就是人的认识对于客观世界的能动的反映过程。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人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才能得到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感性认识，然后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且用这种认识再去指导实践，又在实践中去验证认识与客观世界是否符合、一致。这就是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辩证的相互转化过程。与此相反，黑格尔则认为，如果承认物质的独立存在，承认知识从外界事物的感觉经验得来，就会使认识完全限于感觉的范围，无法把握世界的本质，无法认识物质本身。黑格尔说，“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在他看来，承认唯物论，就不可能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这是他对唯物论的歪曲和诬蔑。黑格尔在这里也象康德一样，形而上学地割裂了物质和精神、感性和理性的辩证关系，否认了物质向精神、感性向理性的辩证的转化。黑格尔认为，要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就必须根本否认物质的独立存在，就必须根本否认人的思想要由感觉经验得来。据黑

格尔说，只有这样，人的精神才没有任何“绝对的外物”与自己对立，才能够完全依赖于自己原来固有的思想的内容，因此，黑格尔公开表示赞成柏拉图的回忆说和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不过他加了许多解释，说人的先天观念原来是“潜伏”在人心中，并非一开始就能明白地意识到，只有经过一个“间接的历程”，经过教育、发挥，才能够使之自觉。这种狡辩，丝毫掩盖不了他的先验论的荒谬性。

黑格尔认识论的先验论性质，还明显地表现在他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根本不是思维去反映存在，倒是存在要去符合思维。他说：“真理就是客观性跟概念的符合。”他举例说，我们称某人为朋友，就是因为某人的行为符合“朋友”的概念。一个朋友的行为如不符合“朋友”的概念，就不是真正的朋友，就够不上朋友。黑格尔想以此说明概念是衡量事物的尺度，事物符合概念才是真的，他说这是“较深意义的真理观”。其实，黑格尔的这种观点把事实和概念的真实关系完全弄颠倒了。我们为什么能够用“朋友”这个概念去评判某人的行为，看他够不够朋友呢？那只是因为这个概念是从现实的朋友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是反映了并且符合于现实的朋友关系的本质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并不是根据“朋友”的概念而是根据现实的朋友关系的本质来衡量某人的行为。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友谊也是带有阶级性的，同一个“朋友”概念，在不同的阶级那里，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反映着不同的阶级关系。超阶级的抽象的“朋友”概念是没有的。黑格尔则恰恰抛开了概念的现实来源，把概念变成超阶级超历史的独立自在的衡量现实的尺度。这就是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先验论时所说的：

“首先，从对象构成对象的概念；然后颠倒过来，用对象的映象即概念去衡量对象。这时，已经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适应了。”（《反社林论》，93页）

黑格尔的以思维与存在同一为出发点的认识论，固然也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形而上学的。辩证唯物论认为，客观世界和人类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只能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只能是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无限的，永无完结之日。黑格尔虽然也说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是矛盾的统一，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对真理的认识不是一下就完成的，但是，他认为，这个过程毕竟有一个终点，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在“绝对观念”完全认识了自己的时候，就完全消失了，就达到了绝对的一，这种同一就是“绝对和全部的真理”。黑格尔狂妄地宣称，“绝对观念”对自己的认识，正是在他的哲学中达到了最后的完成，从而结束了真理的发展。这就陷入了形而上学。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09页）黑格尔的这种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归根结底是为其政治上的保守立场作辩护的。在黑格尔看来，当时普鲁士的反动君主政体的国家就是“绝对观念”的最高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顶点。

黑格尔在他的唯心论先验论的基础上，也竭力宣扬唯心论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马克思、恩格斯说：“**黑格尔的历史观**

又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辨表现。在历史的范围内，在人类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对立表现为：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08页）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上的一切伟大人物实际上就是“绝对精神”在那个时代的体现者，他们的思想、意志和事业都不是从现实的社会来的，而是从“绝对精神”来的。黑格尔认为，虽说这个“绝对精神”是“一切个人的内在的灵魂”，但是，只有伟大人物才有这种“自觉”，而群众必须“由那些伟大人物带到自觉”，“追随着这些灵魂的领导者”。例如，他把拿破仑就神化为什么“骑在上面的世界灵魂”。他还公然说，体现了“绝对精神”的“意志”的伟大人物，就是集合在他的旗帜下的广大群众的“上帝”。他甚至把人民群众诬蔑为“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恶毒咒骂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黑格尔的这些反动思想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被法国大革命的风暴吓破了胆的德国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恐惧仇视的心理。

黑格尔的唯心论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十分反动，所以，毫不奇怪，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他的这些思想糟粕成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

* * *

从哲学史上看，唯心论的先验论作为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早在古代的奴隶社会就已经存在了，经过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一直没有中断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变化，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反动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需要先验论为他们的剥削制度作辩护,都企图用先验论作为他们奴役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唯心论的先验论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是为剥削阶级的政治服务的。

在我国,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反动的剥削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的舞台,他们的思想更是不会轻易退走的。正如列宁所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407页)王明、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企图在中国实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又把历史上剥削阶级所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接了过来,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他们竭力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把精神、思想说成是先于物质、先于经验和先于实践而有的东西。他们的这些谬论,正是历史上那些形形色色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翻版。他们还大肆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把他们这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说成是“天才”、“超天才”,打扮成创造历史的“英雄”,这同从孔子到王守仁,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唯心论的天才论、英雄史观又有什么两样?总之,他们的论点,没有一个不是古已有之。唯一不同的,只不过是把这些唯心论的货色,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璜起来,用来欺骗群众,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已。

列宁教导说:**“在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否定客观真理和承认客**



观真理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超感觉知识的维护者和反对者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21页）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斗争是不会陈腐的。“**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同上，360页）王明、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极端仇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把唯心论的先验论奉为至宝，企图用来对抗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是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的痴心妄想。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决定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毛主席教导说：“**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哲学上的路线斗争和政治上的路线斗争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一定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彻底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和他们的祖师爷所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肃清其流毒，划清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界限，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和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